

罗立刚
著



——论唐宋时期文学观念的转变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中国出版集团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罗立刚 著



——论唐宋时期文学观念的转变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统、道统、文统:论唐宋时期文学观念的转变/罗立刚著.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5.5

ISBN 7-80186-313-5

I. 史… II. 罗…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唐代②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宋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7864 号

史统、道统、文统——论唐宋时期文学观念的转变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上海美术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330 千

印 张: 12.5 插页: 2

印 数: 1—2,100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86-313-5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对于古人的诗歌，我们或许可以不求达诂，可是，对于古人的文章，却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古人绝无苟作文章之事，纵为戏笔，亦有深意。

分析古人的文章，我宁愿作细读式的深入挖掘，绝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字。

—— 罗元刚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部探讨唐宋时期文学观念转变的著作。唐宋时期文学观念的转变,先后在史统观、道统观、文统观三个层面展开,文学观念的转变相应地经历了三个阶段:一、隋及初盛唐时期,在史统影响下,通过与史学观念的比照,文学观念被定格为“质文代变”。二、中唐至北宋中期,在道统影响下,“质”被演绎成儒家之“道”,“文”的观念也发生了阶段性改变。“质”、“文”之辨转化为“文”、“道”之争,最终导致“文”、“道”分离。三、北宋中后期至宋末,在剥离掉史学与哲学影响之后,“文”的内在属性得以充分显现。外在于“文”的因素被消解,“文”的统系意识不断强化,“文统”内部以文体为核心形成的“正”、“变”观,成为影响文学观念的主要矛盾,从而最终使“质文代变”的文学观被“文体正变”观所替代,实现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巨大转型。

目 录

绪论·····	1
---------	---

第一部分 史统影响下的文学观念

第一章 概述·····	7
第一节 史料的条理化与体例的严谨化·····	8
第二节 史观的由多趋一 由文趋质 ·····	16
第三节 隋及唐前期文史关系述概 ·····	26
第二章 类书的编纂与“文”的延续 ·····	32
第一节 古籍的整理与类书的修纂 ·····	32
第二节 文集的整理与《选》学的兴起 ·····	42
第三章 重质史观的提出及其对文学观念的影响 ·····	50
第一节 重“质”复古与“质文殊轨” ·····	50
第二节 史书的修纂与“质”的贯注 ·····	58
第三节 因史重文与南北文风的融合 ·····	68
第四章 文史分离与“质文半取”文学观念的定型 ·····	77
第一节 刘知几的“文史异辙”说 ·····	78
第二节 初唐“四杰”文道殊源的思想 ·····	87
第三节 “汉魏风骨”与“质文半取”观的提出 ·····	96

第二部分 道统影响下的文学观念

第五章 概述·····	108
第一节 学术风气的内敛化转变·····	109
第二节 研治方法从注疏传习转向义理探求·····	118
第三节 由外王向内圣的转变及道统观的确立·····	124
第四节 “道统”观念下“文”“道”关系述概·····	137
第六章 “文”“道”兼取的中唐文学观·····	143
第一节 “文”的内涵的转变与“文”“道”关系的实质·····	143
第二节 “师其意,不师其辞”文学观的提出·····	154
第三节 “古意新辞”诗学观念的提出及其分裂·····	168
第七章 晚唐五代文道分离的文学观念·····	179
第一节 儒学心性理论的深化与“文”“道”关系的新变·····	179
第二节 “道统”的破碎与“文”的渐盛·····	187
第三节 “文”的张扬与文学审美特性的充分显现·····	199
第四节 晚唐五代文学观念的过渡意义·····	211
第八章 文道分统时期的文学观念·····	220
第一节 “师道”的演变与圣贤人格的追求·····	220
第二节 “道统”的封闭与“文”“道”关系的悖离·····	231
第三节 朋党之争中的“文”“道”内涵·····	242

第三部分 文统影响下的文学观念

第九章 概述·····	255
第一节 “文统”概念的提出及其发展过程·····	255

第二节 “文”的新释与“文”“道”分离	263
第三节 欧苏在健全“文统”中的关键作用及“文统”的 阶段性特征	276
第十章 尊体运动与“文统”的健全	285
第一节 从重“道”到尊“文”的转变与“文”“辞”之别	285
第二节 尊“文”之风的兴起及其影响	297
第三节 “诸体同源”与“尊体”运动	306
第十一章 遵体运动与“文统”观的发展	317
第一节 文体意识的强化及其对“文统”健全的刺激作用 ..	317
第二节 遵体运动与因“体”成“统”	331
第三节 文派观的成熟与因“派”成“统”	343
第十二章 文体正变观的初步建立	355
第一节 正“体”之争与以一“正”统诸“变”的文学观	355
第二节 各“体”自成正变的思想与正变观的初步拓展	364
第三节 “文统”独立与文体正变观确立的重要意义	376
附论 元人“一代之文学”观的发明	379
主要引用书目	390
后记	395

绪 论

一般而言,文学观念包括文学本体观、审美批评观、创作观、作家观以及文学史观等诸多方面,文学观念的转变是在大的文化背景下这些方面相互作用发生变化的总体表现。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与变化,有文学自身发展的原因,也必然地受特定的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思潮等背景因素的巨大影响。我国古代的“杂文学”观、功利主义文学审美批评观、文史哲三位一体的文化思维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格局,一直使文学的本质特性难以显现。这就使得古代文学观念的发展、变化,很大程度上受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文化思想的影响,从而使文学发展史表现出明显的不断突破其他学科束缚获取独立的特征。如果我们对整个古代文学发展的历程,进行胆大妄为的抽象和概括,而不顾其生动而丰富的内涵,就可以把从先秦到南北朝时期作为文学本质属性得以突现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里,文学观念经过了先秦时期的融于文化思想、两汉时期的融于经学思想,再到建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自觉”,完成了一个“正题”——“反题”——“合题”的发展历程,那么,从隋唐到两宋时期,在功利主义的文学价值观、宗经复古的文学思潮以及强劲的文学与政治关联的文化氛围下,这一阶段的文学观念明显地走过了由盛唐以前与史统的相融与分离、中唐到北宋中期与道统的相融与分离,再到此后文统内部不断健全的发展过程。这“史统——道统——文统”的发展轨迹,也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正——反——合”的历程。在此后的元明清时期,文学的发展又分明经历了一次文统内部文法、文派、文体等方面不断发展的“正——反——合”的过程。这三个“正——反——合”,每一个过程都体现出独特的质性。第一期主要是在文

化层面上展开,第二阶段主要是在哲学层面展开,第三阶段主要是在美学层面展开。这三大过程又构成了一个更大的“正题”、“反题”、“合题”,从而完成了中国文学在整个古代的发展历程。这三个“正——反——合”彼此关联,具《易》学贞下启元之意。完成了巨大的“正”“反”“合”之后,文学观念的近现代变革才另启新元,从而诞生了新文学。

在这三个巨大的“正——反——合”的发展过程中,唐宋时期文学观念由“史统”而“道统”而“文统”的发展过程,可谓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深入下去可以看出,唐宋时期文学观念巨变的主导因素,在各个时期又各不相同。理性地清理这一时期文学观念演变的过程,找出其中的原因,有利于我们把握古人文学观念发展的脉络,寻绎、揭示其中的规律,有利于我们把握古代文学观念乃至整个思潮发展变化的脉搏。

文学观念在一定的文学思潮中形成,它首先与当时的文学思想密切相关,其次与学术思想、文化氛围等紧密相联,是一定时期人文精神的反映与指标。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特定的人文氛围中,不同的人文因素对文学观念的影响又各不相同,有些因素起主导作用,产生很大的影响,另外一些因素则只有辅助作用,影响不大或者说很不明显。在研究唐宋时期文学观念转变时,我们发现,正是由于几大因素的交互作用与彼此更替,才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不同时期产生影响的因素又各不相同。通过清理这一时期文学观念变化的过程,我们认为,对这一时期文学观念产生巨大影响的因素先后有史学观、道统观、文统观等三方面。我们将之浓缩为“史统”、“道统”、“文统”。所谓“史统”是指在政治学“正统”意识支撑下形成的史学观念及史学理论体系。“道统”则主要指自中唐韩愈等人兴起的带有正统意识的儒学体系。“文统”则是指在正统观影响下所形成的文学创作、批评理论体系。虽说三者各有不同的学科内涵,但贯穿始终的“正统”观,却使它们彼此关联,分别从不同的侧面折射出文学的某些特性,使之从这些“背景”上突现出

来,显示出文学独具的个性与特征。基于此,我们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史学、道学及文统健全等三个方面,并清理出在这三方面因素的先后影响下,唐宋时期文学观念的发展相应地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一,隋及初盛唐时期在史学影响下的文学观念;其二,中唐至北宋中期在“道学”(即道统)影响下的文学观念;其三,北宋中后期到南宋时期在“文统”影响下的文学观念。在这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矛盾冲突也体现在不同的层面上,文学观念因而呈现出各异的特征。在第一期文学观念通过与史学观念的比照,显示出其独特性;“道统”影响下则主要表现为“文”“道”之争,为“文”“道”分离、文学的相对独立奠定基础;“文统”影响下的文学观念则更多地体现出文学自身内在的矛盾冲突。

至于这三个阶段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首先,这一过程正是文学逐渐剥离史学、哲学(主要指传统的儒家哲学)等附着物,不断显现和强化其自身特性的过程。其次,在这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文学观念的核心因素之间存在着至为密切的转换关系:通过与史学观念的比照,南北朝时期特别是南朝超功利主义文学观步入唯美主义的境界显示出充分的文学性后,在新的王朝新的史学要求下,屈从于文学服务于政治的现实需要,被拉回到功利的现实之中,从而糅合南北朝各种文学观念,以南北文风的统一为外在形态,对整个隋唐以前的文学观念作初步总结,将南朝“文”、“笔”之争这个纯文学性的讨论主题放大到史学的背景上进行考察,与当时史坛的质文之辨相呼应,不再以“文”、“笔”相对,而是在更大范围内以“质”、“文”相对,弃“文”、“笔”之争而起“文”、“质”之辨,将文学观念定格在了“质文代变”的观念上。以此为基础,以新创的统一的大唐帝国的浪漫与进取精神,创造性地提出了“质文半取”的文学观。在随后的“道统”论影响下的文学观念,则进一步将“质文半取”纳入到正统的儒学理论体系当中,将“质”演绎成儒家之“道”,并通过“道”来透视“文”。这实际上是一种压缩“文”的固有特性,强行使之与“道”相合的思想。“文”的内涵从南北朝时期的美文,一变而

为“载道”之古文；史统作用下的“文”、“质”之辨也随之转化为“文”、“道”之争。从这样的文学本体论出发，中唐时期，韩愈提出“师其意，不师其辞”的文学观念，以调和“文”“道”矛盾。在晚唐五代时期审美观念多元发展、文学独特个性日趋明显，以及北宋道学思想日趋精致的情况下，“文”、“道”分别从不同的侧面显示各自的属性，暴露二者之间的矛盾，并最终导致“文”、“道”分离。文学的本质属性经过“道”的烛照之后，更为清晰。于是，“文”在借鉴史学的正统观与“道统”的宗法意识之后，渐渐成熟起来，在先后剥离掉史学、哲学遮盖的情况下，“质”、“道”这些外在于“文”的因素被消解掉，“文统”内在的因素上升为主要矛盾，成为促使“文”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力。“文统”观影响下的文学观念，进一步强化了“文”（literature）的统系意识，形成“正”“变”观，成为影响文学观念变化的主要矛盾。随着“文统”的健全，文学的“正”、“变”意识也日益获得理性的认识与阐发，日渐成熟，于是上古以来的“质文代变”观最终被“文体正变”观所替代，从而实现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巨大转型。

文学观念从“质文代变”转向“文体正变”，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质文”、“文道”的矛盾，本质上不是文学自身的矛盾，而是史学、道学与文学的矛盾；“代变”观念，不完全是描述文学史学的概念，而是史学特别是王朝史的概念。这些观念，从字面上就已经表明其关注的重点不在文学自身，而在文学与哲学、史学、政治学等的关系上。与“质文代变”的文学观念相比，“文体正变”观更接近文学的本质，它不再为文学与史学、哲学之间的关系纠缠不清而过多地耗费精力（尽管文学与史学、哲学之间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不能完全割裂开），其关注的重点更不再停留于文学的外围，而是深入到文学系统的内部，将文学自身作为研究的对象，通过文本（文体）分析形成正变观，以之作为推动文学发展的内部矛盾动力，并力图借此寻绎文学发展的规律。从整个古代文学观念的演进历程看，正是文学的统绪意识形成了正变观，进而刻画出诸体之间的关系，使得“文”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并激活了这个

系统内部的矛盾冲突,导致“文”以正变为动力发生蜕变,开始近代化的历程,为近现代以来文学观念的进一步演进和与西方文学观念的对接奠定了基础。

徐铉在《萧庶子诗序》中曾有“文质异体,正变殊途”的话,借用来概括唐宋时期文学观念的转变,可以说是相当恰当的。自古以来,我国文化传统中一直保持着文、史、哲三位一体这一独特的文化形态,但是,这种局面并非自始至终纹丝不动的铁板一块,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轨迹看,其逐渐分化和各自成熟的趋势是很明显的。因为,毕竟文学、史学与哲学有着各自不同的研究对象,各自的学科特征,虽然在古人那里,学科之间的外在差异性与内在本质区别,并不是那么清晰,但是,如果深入解剖,却不难清理出古人学术思想发展的轨迹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学科意识。

必须承认,学科分类的观念在古代是不完整的或者说不健全的,至少是不发达的,但是,通过对唐宋时期文学观念的清理,通过对史统、道统、文统的透析,我们发现,这一时期正是古人文、史、哲思想开始出现分裂的时期。这样的过程足已说明:虽然古代文史哲是三位一体的,但是,经过唐宋之后,史家、儒学先生、文行之士已经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分营,虽然仍保持着彼此兼顾、三者融通的传统,但不同的个体在治学时已经各有侧重,表明到封建社会后期,文人对文史哲这个“三位一体”的关注,至少已经从前期偏重“一体”转向后期偏重“三位”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透过唐宋时期文学观念的折光,使我们看到了古人在学科建设上的不自觉的努力,虽然这种学科意识与西方、与近现代还都无法相比,但正是有了这样的启蒙,才使得西方学科分类的引入能顺利地、完成,而不至于有太多的冲突。

最后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对于这三个阶段的划分,我们不再取朝代更替作为参照系,简单地列举唐代、宋代,而是更多地注重文学观念演进的阶段性规律,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因代立论的格局。历史的发展是连续的,以王朝更替划界来解剖历史,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但不是惟一的方法,特别是当我们研究的对象不是政治、军事、制

度等与王朝兴衰密切相关的对象时,这种分界方法往往就会显得牵强,硬要套用,则有可能肢解活生生的研究对象,影响结论的正确。基于此,考虑到文学观念发展历程的自身规律,我们以中唐、北宋前期欧阳修主盟文坛为界,将唐宋时期文学观念的发展划分为初盛唐、中唐北宋欧阳修前、欧苏主盟文坛到宋朝结束三个阶段。我们认为,这样划分也许更符合当时文学观念发展的历史实际。

第一部分 史统影响下的文学观念

第一章 概 述

从史学史的角度看，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乃是我国古代史学思想趋于完善的重要时期。其时，史料的收集整理、史籍的编纂，史著体例的探索创新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创获，史学观念也不断丰富。汉代司马氏撰《史记》，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观念，后世循此以往，不断前进。东汉人荀悦撰《汉纪》，开宗明义主张：“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能备矣。”其撰史的目的，就是为了质之事实而不诬，通之万方而不泥，可以“兴”、“治”、“动”、“静”、“言”、“行”，达到“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成“有国之常训，典籍之渊林”。可以说，对史学的对象、意义、任务、目的等，都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和透辟的见解，对史学的认识和论述更为深透。史观的进化，促进了史学的科学、系统与完整。汉代以后的史学观念，基本上就是循着这一思路发展的。魏晋以来，在社会动乱和统绪意识的催动下，士人们更加注意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承两汉司马迁、班固余绪，私家编撰史书求“成一家之言”之风十分盛行。以纪传体形式修后汉书者就多达十几家，合计有 1012 卷之多，南北朝时期以编年和纪传二体修晋书较有成就者据载就有 22 家之多，共 862 卷，其中

至唐初尚存者有 617 卷,修史风气之盛^①,于此可见一斑。南北朝时期,王朝更替频繁,国运未昌,但修史工作却一直未停。《宋书》、《南齐书》、《十六国春秋》、《魏书》等,或由私人修纂,或在当政者指定下修成。随着史学著作的不断增多,史籍的地位也不断上升^②,同时,“五胡乱华”与东晋的偏安,更刺激了《春秋》正闰之论的复兴和走向深入。所有这一切,都极大地丰富了史学观念。与此同时,文学也在这一时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文学观念日趋于审美追求而渐渐脱离两汉时期的功利主义文艺观的影响,尚“文”之习成为社会风气,甚至严重地影响了史学观念的纯粹,以至于魏晋以后的史学著作或显或晦或多或少表现出重“文”的一面。以“文”淆“史”,使得“史统”晦暗模糊。隋唐统一,其学术文化,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展开的。可想而知,当时文学观与史学观的密切关系必致相互影响。统一新王朝的实用主义史学观,促使史学迅速走向规范。史统的恢复,势必催生出文史分野的思想,同时又必然对文学观念产生巨大的影响。为阐明这一点,我们先回顾一下隋及唐前期史学建设的几方面特色。

第一节 史料的条理化与体例的严谨化

隋唐继起,史学全面兴盛。隋代国运未昌,于史籍却颇为留意,搜集、整理往古古籍,蔚然成风。政府曾重价搜求相关史料,官府藏

① 此处所引数据,参考王树民先生著《中国史学史纲要》(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相关论述得出。

② 西汉刘歆撰《七略》,史书只附于《六艺略》中《春秋家》后。东汉以还,郑默编《中经》,按甲乙丙丁四部分类,史书居于书之后,位居第三。到东晋李充编定书目,史书从丙部升至乙部,地位仅次于经。南朝宋王俭编《今书七志》,史传入第一类“经典志”,地位再度升高。阮孝绪编撰《七录》,因史籍数量太大,不得不与经籍分开。但为了避免降低史籍地位的误解,阮氏特于序中详明其因:“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今依斯例,分出众史,序《记传录》为内篇第二。”史籍虽被从经类书籍中分开,却并非受到轻视,而是由于数量“倍于经典”,而且在析出之后,也是置于“内篇第二”的位置,地位仍相当显著。

书达200余万卷,又曾编成《大业正御书》,还编成了多种综合性书目,于史料学建设颇有功绩。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李唐建立后,接受了叙往古以察来今的史学观念,有惩于南北朝的亡乱相续和隋朝的国祚不永,很注意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修史之风更盛。唐朝立国不久,即注重进行史学建设,为避免私修史书造成的各种弊端,政府出面全面推开官修史书的庞大计划。计修断代史书六部,志书一部,又修《南史》、《北史》二部^①。此外,私人在史料收集与整理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史料学的积累十分丰富,史书的编纂快速而且大量进行,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在大一统的国运和强盛的国势背景下,唐人开始全面总结前人史观,且使之更为系统、深入,更切近史学的本质。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史料的整理由芜杂趋于有序。

汉末大乱,三国鼎立;五马南浮,中原板荡。有识之士依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成法,兴起史学。但是,魏晋以来,史官失职,除《三国志》、《宋书》、《魏书》被后人视为正史,另有起居注等史料能保证其真实性以外,其余诸作,多出自私人之手,受撰史者识见、个性、趣尚、史观等影响,史料收集真伪并存、良莠不齐。翻检《隋书·经籍志》中史部分类目录,按刘知几“以叙事为宗”的原则依照各类“小序”及分类名称来作判断,别出“叙事”者,制成下表(见下页表),从中不难看出,隋代以前史学的兴盛,主要是以叙事见长的“杂史”^②类而非“正史”类。

① 《南史》、《北史》虽由李延寿私撰,但其前提条件首先在其父李大师的准备工作,更重要者还在于李延寿自己进入初唐史馆,直接参与修史工作,因而得以广泛参考官方史料。具体编撰时又多据已成官修史书割裂删节,成书之后,即进呈御览,公布于众。因此,这两部书虽是私人撰成,却不脱官修底色。

② 这里是就《隋书·经籍志》中“杂史”、“霸史”、“旧事”、“职官”、“杂传”、“地理”等几类而言。至于“正史”类,除书中所列“正史”外,还有“古史”一类,其余“仪注”等五类,则明显不“叙事”,故不计算在内。